胡力骏，邵甬，陈欢．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探索：以湖南为例[J]．风景园林，2026，33（4）：29-38．

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探索——以湖南为例

胡力骏　邵甬*　陈欢

摘要：【目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融合保护是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针对目前文化和自然遗产本体及价值缺乏整体认知、遗产保护空间缺乏精准识别，以及遗产保护与协同发展空间缺乏有效管控的局限，需要构建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的技术路线。【方法】从遗产资源的区域性、关联性特征出发，加强对遗产资源的整体价值认识，挖掘具有独特地域性和景观性价值的资源。在省级层面识别“地域特色分区”和“重点单元”2个尺度的保护空间，并确定空间管控、引导与保护要求传导的工作方式。【结果】结合湖南省整体保护的规划探索，在进一步挖掘各类资源的基础上，确定底线管控、景观控制、利用引导、风险应对等保护、管控与引导措施，以延续有价值的景观风貌，利用从省级、市县级专项规划再到详细规划的传导机制，将保护要求落地。【结论】从而建立“整体价值认知—保护空间识别—空间管控引导—规划传导落实”的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技术路线。

关键词：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区域性

基金项目：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自主课题“区域性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传承体系研究”（编号 KY-2022-LH-A01）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章编号：**1673-1530(2026)04-0029-10　　**收稿日期：**2026-01-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24/j.fjyl.LA20260027　　**修回日期：**2026-03-22

文章亮点：

1、构建了省级尺度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的规划技术路径，突破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分别保护的局限。通过识别“地域特色分区”与“重点单元”2个层次的空间载体，在省级层面实现了对遗产资源区域性、关联性特征的系统回应，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专项规划的技术方法提供了创新探索。

2、通过湖南洞庭湖堤垸单元规划的管控要求传导示例，明确了从省级专项规划到市县级规划的传导路径，显示了规划的可操作性。

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近年来，中国对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不断加强遗产保护的顶层设计。在文化遗产领域，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提出了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要求。当前各地踊跃编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系统梳理本省、本市遗产资源及其价值，在原有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体系的基础上，挖掘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等，并开展老城区、老街区调研。在自然遗产方面，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科学合理地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随着两大类遗产的系统保护不断加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也得到更多关注。在2024年北京中轴线和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成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1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融合的再认知

1.1 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到“naturecultures”提出

国际遗产领域在文化与自然的互相促进方面已经开展多年努力。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就提到“考虑到在一个生活条件加速变化的社会里，就人类平衡和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为人类保存一个合适的生活环境，以便人类在此环境中与自然及其前辈留下的文明痕迹保持联系。为此，应该使文化和自然遗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把当代成就、昔日价值和自然之美纳入一个整体策略”[1]。同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也创新性地将文化和自然2个部分整合在一个国际公约中。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 ICOMOS）在2016年发布的《关于自然-文化之旅的夏威夷宣言》（也称Mālama Honua——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中指出：在面对全世界范围内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严重威胁和挑战时，人为地分割文化与自然会使人类走上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认识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采取自然-文化融合的方法对于保护遗产有着积极作用，它不仅培养了文化多样性，支持了城乡地区当代社会的福祉，且有利于可持续发展[2]。2017年，IUCN和ICOMOS进一步发布了《自然-文化之旅Yatra声明》，特别提出“naturecultures”（自然文化）这一概念，该英语词汇中没有出现空格、连字符或“和”字对自然和文化进行连接，因为自然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是交叉和相互融合的，因此有时这个词被直接译为“自然文化关联性”[3]。“naturecultures”一词包含生物多样性、地理多样性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等概念，同时也包含多重视角的学科和世界观[2]。2021年，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的《福州宣言》进一步提出，应建立人与自然新型关系，采用综合性方法来保护遗产[4]。

©Beij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Periodical Office Co., Ltd. Published b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license.

1.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融合观与规划实践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究文化与自然的紧密交融，“天人合一”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国土空间。在自然环境中，泰山、黄山、长江、黄河无一不蕴含着浓厚的人文色彩，名山大川往往也是人文精神的高地；在人文环境中，城市和村镇建设讲究与自然山水的因借，古典园林将自然元素诗意地融入建筑环境，营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意境。自然是文化之源，文化是自然之魂，两者的互相渗透，展现了中华文化的自然底蕴与人文情怀。

中国的遗产保护逐渐由分类保护走向整体保护。其中，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城是 2 项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进行系统保护的典型代表。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风景名胜区是综合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一种保护对象，承载着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独特文化基因，是最具特色的保护地类型[5]。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中同样也贯穿了对自然环境的重视。2005 年执行的国家标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就已经明确：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内容包括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自然地貌、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6]。在 2018 年修订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中更加明确：名城的保护包括城址环境及与之相互依存的山川形胜，规划要对城址环境的自然山水和人文提出保护措施，对城址环境提出管控要求[7]。

2020 年启动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政策在系统构建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模式、落实保护行动的同时，还通过市政交通设施改善、水系环境治理等工作，使村落之间的自然环境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在迈向整体性保护上取得了较大进步。

因此，一方面需要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在制度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也需要在规划技术上破解当前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存在的问题。

1.3 国土空间视角下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认识

世界遗产中存在一类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同时具备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 2 种条件，如中国的泰山、黄山等既呈现或雄伟或奇秀、出类拔萃的自然风光，又拥有历代丰富的人文积淀，两者融合，从而使遗产拥有更高的价值。2025 年 9 月，国家文物局、国家林草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公布了第一批“国保单位 · 古树名木”协同保护名录，开创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结合保护的范例。

以上 2 种整体保护的情况均属于“高等级强强组合”，在国土空间视角下，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呈现出更丰富多样的场景。部分文化价值较高的遗产或者是文化资源富集的区域，与周边关联的自然环境结合，体现出更整体的价值，如集中连片的传统村落不只是“点状”资源的集合，孕育遗产生长的区域自然环境及其所承载的人地关系尤具价值；一些自然保护地内适度的人类生产活动，反而能帮助改善生态环境，如湖南崀山通过实施“鹞田一分”行动，在朱鹮活动区，稻田按照 10 ∶ 1 的比例留出鸟类觅食区域，实现促进野生种群繁育的目的[8]；还有通过人类活动改造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独特地景，如堤垸圩田、茶园梯田等文化景观。

文化和自然整体保护的本质是保护人与自然相互塑造、动态演进的关联性，需要在价值、对象、空间层面对遗产资源的关联性特征进行再认识。在价值层面，将文化和自然视为统一整体，跳出单一维度的价值研究，关注要素间因关联而复合的更高价值；在对象层面，保护内容不是已公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集合或交集，而是在复合价值的基础上对现有体系没有覆盖的内容进行增补强化，特别是拓展具有文化和自然关联价值的遗产；在空间层面，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不再局限于单体文物或单个保护区，而是将遗产与其所在的山水环境、历史脉络、区域功能视为一个有机体，形成区域性的完整保护空间。

与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相比较，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应侧重于保护文化遗产所依托的自然环境，将相对孤立的文化遗产整合起来；与自然遗产保护体系相比较，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应在公布的遗产之外，关注那些独立个体价值不明显，但对依附其上的其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或具有成片整体价值的自然资源。通过建立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体系，一是坚持“守底线”，通过拓展对遗产的认识，挖掘具有复合价值的保护对象，保护好遗产关联的景观和环境；二是促进“活起来”，更客观地对待遗产动态演进，特别是通过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避免将遗产视为不变的客体，这对于当前人居型文化遗产及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尤为重要；三是导向“可持续”，通过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促进“社会-生态”韧性循环，为未来创造更高价值的遗产。

2 当前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的局限

《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提出，要充分认知各类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与关联性，协同自然遗产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9]。但由于目前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采取按行政条线管理的方式，各类遗产资源分别建立保护名录，分属不同职能部门进行管理。而各部门职能定位、工作目标存在差异，在保护内容确定、保护空间识别、保护要求统筹方面均未实现系统、整体的研究和保护。

2.1 遗产本体及价值缺乏整体认知

由于各职能部门对所辖遗产价值的认识较为单一，因而对物质空间本身价值不突出的遗产资源的认识相对欠缺。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意义（但缺少物质遗存）的自然环境，因本身特色在局部区域不够鲜明，而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湖南湘江及其主要支流上存在着形态丰富、大小各异的沙洲，是流水堆积和洞庭湖水系顶托形成的特色地貌，也是历史上潇湘人文景观的重要依托（图 1）。由于单个沙洲的观赏价值和生态价值不突出，因而采石挖沙、过度开发建设、硬化堤岸等人为破坏行为未受约束，造成沙洲生态和景观特征受到破坏，部分洲岛不复存在或完全人工化[10]。因此，需要通过对遗产更全面的认知来推动整体保护。

2.2 遗产保护空间缺乏精准识别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空间的划定往往从本

体出发，随着与遗产本体之间距离的增加，保护的要求和力度逐渐降低，这固然由遗产本身保护需求所决定，但客观上也受当地发展建设的制约。因而对遗产保护范围外的自然环境，若非涉及极重要的视廊通道，一般难以通过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进行有效管控，即便在文化遗产富集的区域，保护空间也往往基于单体对象分别划定，形成孤岛式保护，而对承载这些文化遗产的整体自然环境则相对忽视。如云南省沙溪古镇地处传统村落集中、历史文化价值高、环境优美的小型坝区，尽管各个村镇制定了严格的保护规划，但坝区整体并不是保护空间，因而坝子边缘山腰上以常规方式修建了高速公路，对区域整体景观造成了严重破坏（图 2）。同时，由于高等级基础设施的审批和管理层级高，基层在实施中即便发现问题也为时已晚，必须在更高层面的规划中协调解决。



1

2

1 人工化的橘子洲（1-1）和自然的兴马洲（1-2）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
The artificial Juzizhou (1-1) and the natural Xingmazhou (1-2) present completely different landscapes

2 高速公路建设切割了山体，对沙溪坝区整体景观破坏严重
Construction of the expressway has severely damaged the overall landscape of Shaxi Dam area by cutting into the mountain

2.3 遗产保护与协同发展缺乏有效管控

对于遗产，不仅要考虑物质空间的保护，也要关注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当今大部分遗产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进行适应性改造的结果，当代对遗产的传承利用也需要与周边的环境展开互动。因担心“绝对式保护”阻碍发展，而对遗产“不愿多报”、对保护空间“不敢多划”，反而造成对遗产资源缺乏有效管控，威胁着潜在资源的保护存续。因此，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并不是另立保护名目，而是基于区域内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价值的认识，确定合理的空间保护范围，并从兼顾保护和发展出发，对国土空间进行有效管控，既要应保尽保，更要合理引导，通过规范建设活动，营造更有魅力的国土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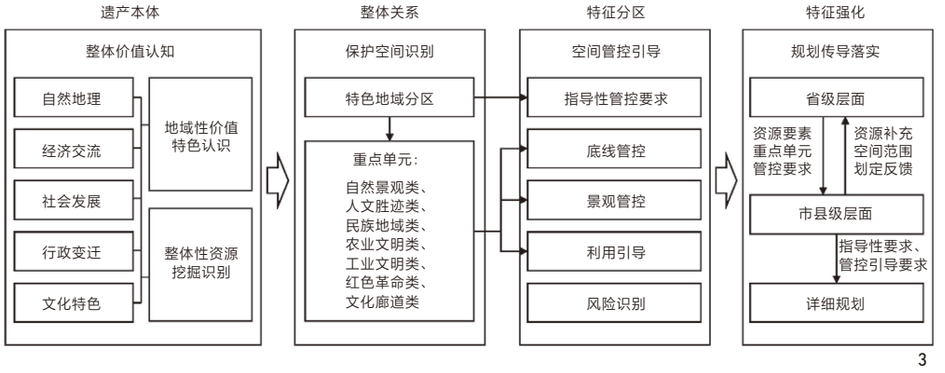
3 制定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的意义

以历史层积、整体互动、要素关联为特征的历史文化空间整体保护已基本达成共识，具有国家级价值的遗址、区域文化圈、大河流域等空间已经尝试对区域性文化资源进行充分挖掘和整体保护[11]。但受到各类遗产保护管理在空间和职能上的限制，对遗产的价值认识存在局限，对遗产环境的管控措施也因缺乏协调的政策支持难以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改革，通过“空间全覆盖”和“一张图”的整合，为打破各类遗产各自为政的保护技术壁垒提供了契机，相关保护与管控措施可以通过用途管制、规划许可的途径转化为可落地的规划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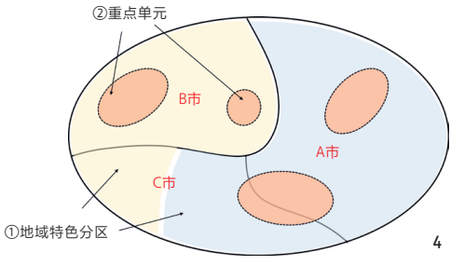
目前，以文化遗产为主体的整体性保护已有较多探索，研究对象尽管涵盖自然遗产，但多聚焦于特征与价值总结[12-14]，对如何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如何在区域尺度上进行空间管控与用途管制较少涉及。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张兵等针对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提出了构建更综合的整体价值评估系统、通过统一的“国家遗产”概念加强部门协作等构想[5]；白晶等提出了自然和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利用框架，并对不同层级整体保护规划的工作重点进行了探索性建构[15]。整体保护的规划技术方法和传导落实尚缺乏更深入的研究。

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需要基于遗产的区域性和关联性特征，协调各类资源，研究确定保护空间。因此，它宜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一项专项规划。其工作重点不是对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分别保护的简单汇总，而是解决两者分别保护的不足，并通过空间管控与用途管制等方式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于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具有的关联性价值特点和区域性空间特征，在侧重协调性的省级尺度国土空间规划对保护体系进行整体构建最为合适，这既可对后继市县层面的规划进行细化指导，更可协调跨区域遗产的空间关系。

整体保护规划作为一项专项规划，需要理清与已有省级规划之间的关系。当前，省级层面的相关规划有住建系统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自然资源系统的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规划，部分省还编制有文物保护空间规划。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以“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体系”构建为主，在空间层面通过历史文化区、历史文化廊道等强化保护传承工作重



3



4

3 整体保护规划技术路线
Technical roadmap for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ning
4 省级保护空间层次关系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provincial protection spatial hierarchy

点，但非空间性规划。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规划重点解决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边界不清、权责不明等问题，明确具体空间范围，但侧重梳理保护边界和要求的技术问题。文物保护空间规划更加强调文化标识性，重点片区虽然依托文化关联性确定，但侧重文物本身的系统保护，对文物以外的空间缺乏关注。

4 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的技术方法

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在价值维度上须挖掘文化与自然在价值上的统一性和关联性，识别个体价值有限但具有整体价值的魅力国土资源，弥补既有资源的不足；在空间维度上，须体现从“点”到“区域”的拓展，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强化对遗产周边环境的管控，协调地上空间与地下资源的保护与发展，从而守好遗产保护的底线；在政策维度上，强调部门协同和机制创新，打破信息壁垒，在技术标准统一、项目联合实施等方面深化合作，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引导地方合理发展；从而在技术维度上，构建“整体价值认知—保护空间识别—空间管控引导—规划传导落实”的规划技术路线（图 3）。

4.1 遗产本体：整体价值认知

自然地理和文化的多样性让不同区域的城乡环境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基于整体价值的认知，应当在当前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识别能够反映土地演变、人地关系、区域关联，且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景观性价值的资源，主要包括 4 类。1）自然景观资源，主要指记录了地球历史演化信息，且具有独特观赏价值的资源。2）演进类的文化景观资源，主要指见证传统人居生存的智慧，通过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改造利用，发展出的独特大地景观。3）关联性的文化景观资源，主要指具有宗教信仰、文化寓意的自然景观空间，因信仰而被赋予了一种文化上的“灵性”或“神性”，即便空间内不存在文化资源。4）遗产廊道资源，主要指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整体性线性空间，大多以水系、道路、铁路等为纽带，在自然基底环境中，联系起沿途文化资源，呈现出多元的景观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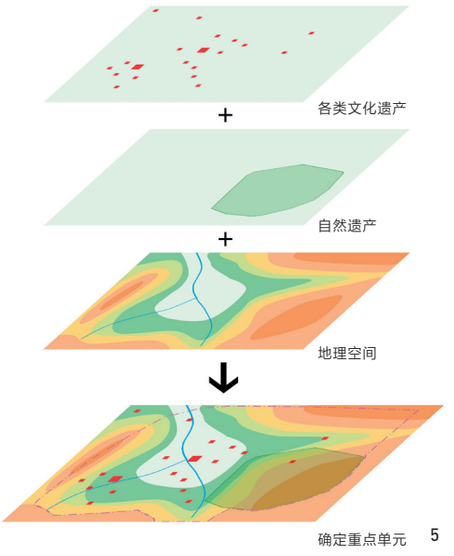
4.2 整体关系：保护空间识别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原本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即便在一省之内也富有差异。在快速的城乡建设中，许多城市不仅存在“千城一面”的问题，其强大的改造能力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威胁，不适当的削山填谷、围海造陆导致了景观的平庸化，标准化的道路、堤坝工程则将完整的自然景观割裂开来。由此可见，文化和自然的整体保护，既需要识别并确定需要重点管控的空间，也要考虑保护空间所依托的区域特点。

规划应构建由地域特色分区和重点单元 2 个层次构成的保护空间（图 4）。地域特色分区是对全省空间进行全覆盖划分，以延续地方空间特色为目标，引导各地保护和延续有差异特色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农业空间和建设风貌，使城乡发展和各类遗产保护能依托完整的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环境。重点单元是最能体现一省文化与自然遗产整体价值的空间，也是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与管控的重点区域。重点单元的识别认定应以价值为导向，遗产资源富集，核心资源或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具有突出价值，或能代表一省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特殊性，或展现独特的文化交流、人地关系、人居智慧等。重点单元既是景观单元，也是管理单元。作为景观单元，在空间上，它应具备一定的完整性，包含比较明确的自然地理空间，如一条河谷、一个完整的山间盆地等；在资源上，它应有较为集中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且资源间具有关联性，体现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图 5）。作为管理单元，它是文化和自然整体保护的空间抓手，在重点单元内落实保护区划和管控规定，并可针对存在风险的项目激活评估程序。

4.3 特征分区：空间管控引导

在“文化-自然”整体视角下，既要整合各类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各类自然遗产保护范围、加强环境本底保护，更需要从遗产整体价值出发，在地域特色分区和重点单元 2 个尺度上进行空间管控引导，指导景观风貌的整体延续和重点保护，展现地方国土空间魅力。地域特色分区的管理要求以引导为主，对相关市县提出延续历史文脉、突出地域特色方面的指导性措施。重点单元以保护和延续景观特色为目的，重在明确管控要求：1）进



5 重点单元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key units

表1 整体保护规划的规划协调与传导指标
Tab. 1 Planning coordination and transmission indicators for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

分项	省级规划传导指标	市县级规划衔接细化	与其他规划对接协调
资源体系构建	文化、自然遗产类型与名录（国省级）	增补市县级资源类型和名录	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潜在资源典型类型与认定标准	在省级初步识别的点位、线路、集中区开展市县级资源挖掘工作	
	增补资源潜在分布区		
	核心增补资源名录	核实省级资源名录；增补一般的或新发现的整体保护资源对象	与保护专项规划对接保护对象；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重点单元管控	单元类型与边界（初步划定）	划定重点单元空间边界，明确规模，明确重点单元涉及区县（乡镇）名录	省级层面与省级传承体系规划中的重要节点、廊道相协调
	单元范围划定方法		
	核心价值	深入研究，指导资源挖掘与传承利用	
	单元内资源类型与名录	增补市县级资源与新挖掘资源名录	
		落实历史文化保护线、自然资源保护线	市县级层面与专项规划等对接保护区划；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需要保护的空间	明确遗产与环境的关系特征、农田肌理特征、村落布局特征等	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需要保护的景观	明确重要标志物，景观视廊、界面与天际线	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划定必要的景观协调区范围线	
	建设行为类型负面清单	落实负面清单涉及区域及具体措施	传导管控与引导要求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用途管制负面清单	落实负面清单涉及主要区域	
	活化利用引导建议	内容落实到具体区县	
	协同发展区县名录	核实细化至乡镇	
	协同建设内容	落实需要衔接、共享、差异化建设的交通、文旅、公服内容	落实到详细规划、村庄规划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类型	进一步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项目	与其他专项规划协调
	重大风险项目清单	核查项目，判定风险等级，提出解决策略，如需省级层面解决，及时向上反馈	

行底线管控，保护遗产资源的真实性、完整性，对影响单元主要景观的特定区域制定限制性管控措施，明确原则性的用途管制要求；2）进行景观管控，重在协调遗产与周边空间的整体性，提升视觉美感，对建设空间的布局特征、区域整体景观特征、重要视廊视域、资源点之间的关联空间、基础设施配套等提出要求和建议。

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规划为应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矿产开采等具有区域性特点、决策层级较高的项目带来的风险，提供了有力支撑。当潜在建设项目与数据库中的重点单元重叠时，即可及时响应，启动遗产影响评估，为用地预审提供依据，进而调整项目规划或通过采取优化措施避免破坏遗产环境。

4.4 特征强化：规划传导落实

在区域尺度下，文化与自然遗产整体保护的管控要求，既无法在以协调为主的省级规划层面完全明确，又难以在空间有限的市县级规划层面整体把握，需要通过 2 个层面的规划传导衔接予以落实。

省级规划的要求可通过各地市独立编制的市级整体保护专项规划或者跨地市的重点单元整体保护专项规划进行保护要求的传导与细化，作为详细规划编制依据。跨地市规划由相关地市联合组织编制，或者由省级主管部门委托主要地市组织编制工作，相关地市予以配合。如无条件编制市县级专项规划，应该在市县级层面进行专题研究，纳入总体规划作为详细规划编制依据。

省级专项规划到市县级专项规划的传导内容重点在于资源要素、保护空间、项目风险 3 方面。涉及空间定位、范围划定、管控要求细化，以及跨地市协同、重大项目风险预警等内容（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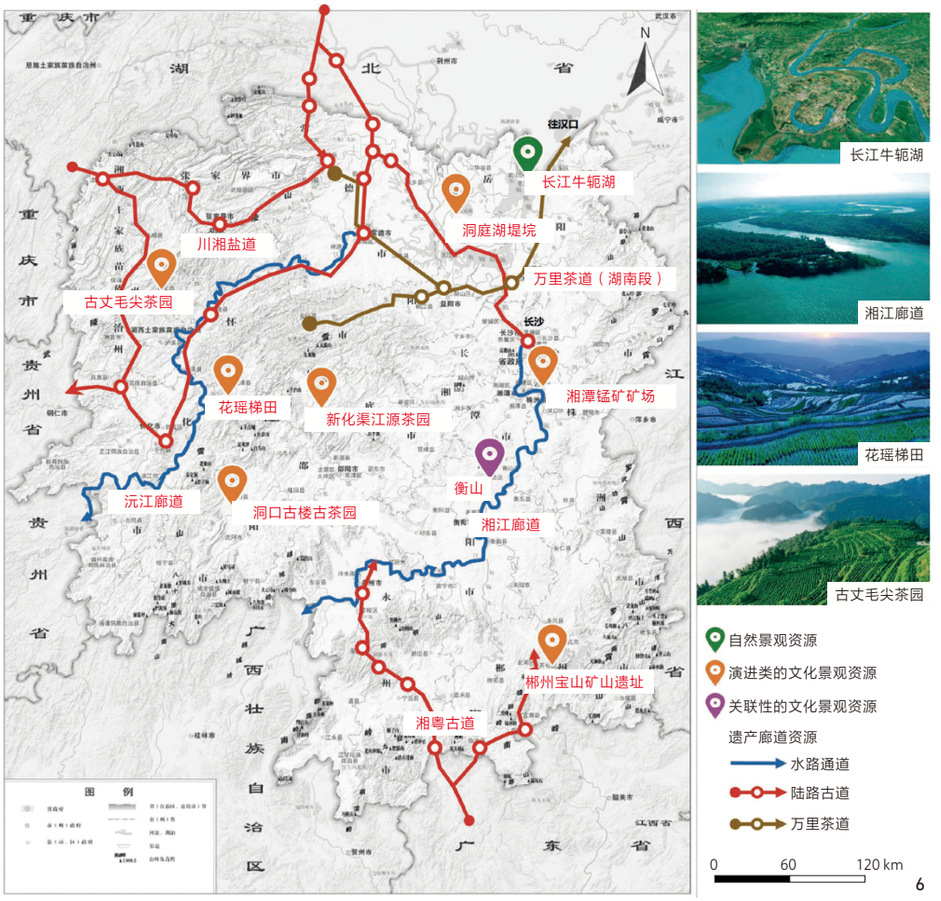
资源要素上，省级规划要明确省级以上的遗产要素点位，并挖掘重要的整体性保护资源，市县级规划则要落实各级遗产资源，并完成保护控制线的划定。

保护空间上，主要传导重点单元管控内容。省级规划明确重点单元名录和边界划定原则，并对单元空间范围进行初划。市县级规划中根据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实际分布及相关空间对遗产的景观影响，对省级规划初划的范围进行准确划定，并承接省级规划提出的管控与引导要求，基于遗产价值、空间特点、景观影响、经济发展、生活需求等因素，对单元内具有不同景观价值的空间提出具体的保护要求、景观风貌意向和利用建议，对各项建设活动进行规定和引导。相关要求可进一步传导至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的用地类型、空间设计，并将建设指标予以落实。

项目风险上，省级规划进行区域性重大项目风险预识别，形成潜在风险清单。在市县级规划中对潜在风险项目的具体位置进一步予以校核、评估，研判风险等级后制定相应措施。

5 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规划探索

湖南省位于中国中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底蕴深厚，遗产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秀美。以雪峰山为界，东部的



6

6 湖南关联性遗产资源识别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identified interrelated heritage resources in Hunan

平原丘陵地区与中原和岭南联系密切，是历史上北方移民的主要聚集区域；西部的山地区域通过山间航道、古盐道等沟通川黔，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区。湖南省文化与自然整体发展关系紧密，各区域的地域特色显著，在多元丰富的自然空间基底上，湖南人民创造出与自然环境相依托的多样化文化空间，进行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5.1 基于整体价值的关联性遗产资源挖掘

湖南省已公布的各类遗产数量众多，但呈现碎片化保护的状态。因此，对遗产资源的再认识，重点不在于进一步增加遗产数量，而是加强对以下 4 类具有空间整体性、关联性特点的资源识别，以弥补当前保护体系的不足。

自然景观资源重点关注与物质空间相关内容，包括水文类和地质地貌类。长时段的地质、水文、气候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诸多特殊水文与地貌景观。其中，较具特色的有牛轭湖景观、沙洲景观、微丘景观等类型：长江沿线的众多牛轭湖及关联性空间，反映了长江在历史进程中反复游荡的特点；“湘资沅澧”四水中的沙洲，是水流、波浪堆积作用形成的地貌景观；湖南气候湿润，起伏的低岗地貌上植被繁茂，湖南微丘景观是长时段自然侵蚀与沉积的结果。

演进类文化景观资源有农业类、产业类和聚居类，包括圩田、梯田、茶园、矿场、民族村寨群等。如洞庭湖周边的堤垸，是大规模有组织地对水泽空间进行人为改造、开垦为耕作区的结果。宋元时期即有筑堤的记载，明清时期筑堤活动进入高峰，新中国成立后仍有相关工程延续。各种类型的堤垸均存在历史和科学价值。再如雪峰山区的茶园，是万里茶道南端重要的供茶基地之一，满山梯田茶园既有实用功能，也展现出“绿色生命律动”的景观效果。

关联性文化景观资源在湖南最为突出的代表是衡山与湘江。衡山是中华封禅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宗教圣地，被视为“天人沟通”的纽带空间，山与祭祀场所形成“自然-文化”共同体。而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多河湾、多沙洲漫滩，具有自然、优雅的特色。最早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的潇湘八景，甚至开创了一种文化范式，影响到东亚文化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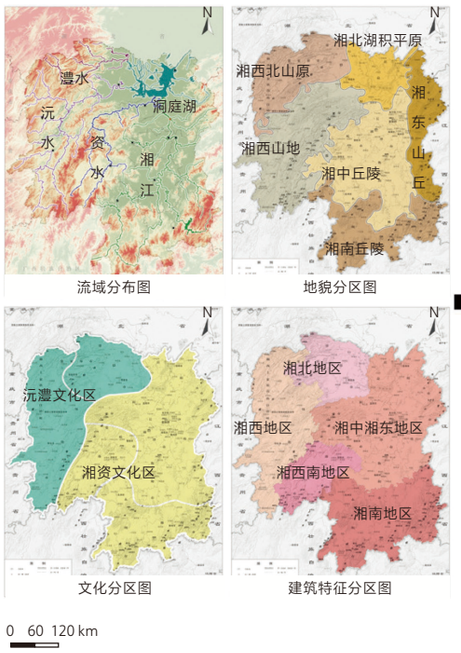
遗产廊道资源在湖南通过陆路廊道与水路廊道，跨越平原和山地，沟通荆楚文化圈与岭南、川黔，具有文化交融性和地貌景观多样性的特点，重要廊道包括湘江、沅江水道、万里茶道（湖南段）、湘粤古道、川湘盐道等（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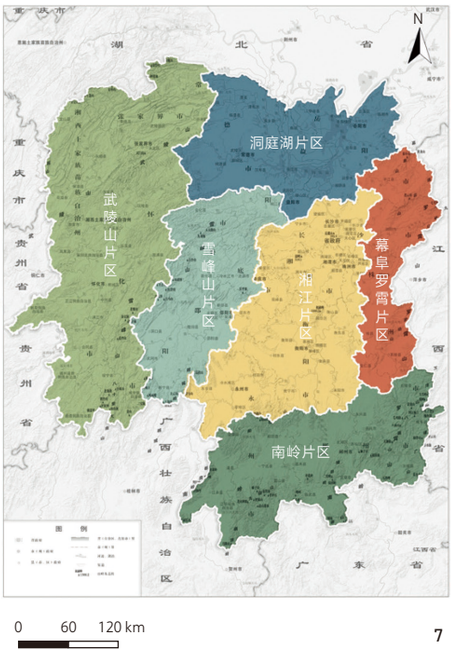
5.2 基于地域特征的保护空间识别

从历史脉络梳理与发展机制研究中可知，区域景观的差异源于自然地理、社会文化和人工建设的差异。自然地理方面，湖南地处中国第二、三阶梯分界线两侧，不同阶梯和流域在地形地貌上有明显差异。雪峰山以西区域地势高，多山地；雪峰山以东为山地向平原过渡地带，多丘陵盆地；湖南北部洞庭湖与江汉平原（长江）相连。建设风貌方面，人口迁徙与民族聚居是土地全面开发的主要原因，北方移民由湖北、江西方向迁入并沿湘江流域向南拓展，少数民族向西南山区聚集，影响了不同区域的民居建筑特征，形成鲜明的建设风貌分区。社会文化方面，可基于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进行特色分区，根据张伟然的研究，湖南的文化区域可分为两大分区、5 个亚区[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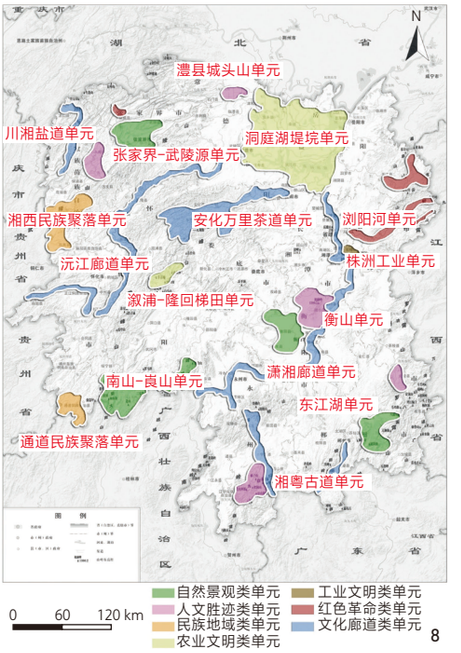
本研究以与土地相关的地理空间和建设特征为基础，以文化层面因素为参考，对全省空间进行了全覆盖划分。结合保护与管控要求传导的便利性，以县为单位将全省划分为 6 个地域特色分区（图 7）。

在此基础上，选取能代表湖南地域文化和景观特色的区域，确定为重点单元。根据





7



8

7 湖南地域分区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regional divisions in Hunan

8 湖南重点单元分布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key units' distribution in Hunan

各单元核心价值和空间特征差异，划分自然景观类、人文胜迹类、民族地域类、农业文明类、工业文明类、红色革命类、文化廊道类 7 种类型，并将现有各类保护对象周边关联的自然环境、聚落生产空间、区域性廊道及沿线节点，整体纳入单元范围（图 8）。

以洞庭湖堤垸单元为例。洞庭湖水域广袤，周边长江泄洪河道密集，季节性水文景观特征突出。湖区周边历经不同时期的人工改造，形成了大量堤垸。这一区域是湖南农业生产、水利调控、聚落建设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性的独特见证，呈现出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农耕文化的代表性景观。洞庭湖生态环境的保护离不开周边堤垸的保护，故将两者整体划为一个单元。

5.3 强化地域特征的保护管控与利用引导

在地域特色分区尺度上，规划应明晰主导性景观特征，提出延续历史文脉、突出地域特色方面的指导性管控要求，达到各美其美的效果。如湖南北部的洞庭湖片区，重点保护长江及洞庭湖水景及平原农业景观，延续“湖-垸-平原”的开阔疏朗特点和稻作文化特色。

在重点单元尺度上，除了制定底线管控和建设管控要求，还增加了景观营造与活化利用引导，导向更协调的景观营造。以洞庭湖堤垸单元为例。底线管控方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明确涉及的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保护。建设管控方面，通过制定负面清单，强化洞庭湖堤垸的农业景观，达到建设风貌管控和重要文物节点景观视域管控的目的，如禁止在湖区、湿地、水塘空间进行大规模填埋或其他人工化建设，蓄洪垸禁止进行较大规模的新建活动，重点垸新增建设不应沿干堤发展等。景观营造与利用方面，则以正向引导为主：保护水面、湿地空间，营造具有自然乡野气息的整体景观；种植兼具美观性与本土特色的植物，营造优美且适于鸟类栖息的湿地景观；鼓励配套建设观鸟平台、栈道等设施，引入科普教育、观光体验相关产业。

5.4 分类细化要求的规划传导

市县级层面规划将对重点单元的空间特征进一步细化研究，落实省级层面确定的管控与引导要求，制定具体措施。以洞庭湖堤垸单元为例（表 2）。省级规划提出“保护堤垸堤防、渠网、垸田、聚落、湿地的整体空间特征，针对性塑造堤垸景观”。市县级规划针对这一要求，结合单元内空间分区细化管控要求，在林木种植管控、渠网与河道管控、垸田管控、大型设施管控与村镇建设管控等方面，明确管控措施，以管控图则（或图示）的形式，指导村庄规划编制和建设实施（图 9）。

6 结语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的本质，是保护人与自然相互塑造、动态演进的关联性。省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保护专项规划对于从区域性角度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最为合适。本研究结合对湖南省的规划探索，建立了“整体价值认知—保护空间识别—空间管控引导—规划传导落实”的规划技术路线。1）通过对文化和自然的关联性研究，可加强对遗产资源的整体价值认识，增加对具有地域性和景观性价值的自然景观资源、



9

9 堤垸空间管控要求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dike space control requirements

表2 洞庭湖堤垸单元规划传导内容示意（节选）

Tab. 2 Planning transmission for the Dongting Lake unit

分类	省级规划内容	市县级规划内容
价值特征	环湖堤垸是当地农业生产、水利调控、聚落建设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性的独特见证	堤垸由堤防-渠网-垸田-聚落构成、以主堤限定边界。根据洞庭湖区微观地形地貌的差异，堤垸景观主要有冲积平原型、丘陵河网型、丘陵湖汊型3类
		冲积平原型堤垸形成方格网形式的渠网与农田肌理，聚落基本为平原型，沿堤防或水渠分布
		丘陵河网型堤垸形成以水面为中心的放射网格状肌理，聚落以孤丘型为主，沿水渠分布或沿地形散布
		丘陵湖汊型堤垸整体肌理顺应地势而呈现不规则交织状，垸田沿等高线开垦，聚落多为孤丘型与山岭型
建设管控	限制单元内的各类规模建设活动	控制集镇规模，不宜沿圩堤进行各类规模建设活动。延续村落布局特征，严格控制村落合并
		控制乡道路幅，不宜超过双车道。新增道路走向应与现状肌理相符
		大型过境交通设施走向与圩堤防平行时，应保持500 m最小间距，交会时平面线形应垂直交叉
		对单元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明确潜在的洪水、堤坝溃决等高风险区域
景观营造	保护堤垸堤防、渠网、垸田、聚落、湿地整体空间特征，针对性塑造堤垸景观	垸田管控：在满足基本农田要求的条件下，不宜填埋反映历史水位信息的鱼塘为旱田
		林木种植管控：宜沿堤垸内河道、大型水塘、垸田截水渠、村宅周边、公路平交段种植林木，塑造景观。禁止沿干堤、垸田间斗渠等种植林木
		渠网与河道管控：根据堤垸所处微观地形地貌的特征，维持堤垸渠网形态的多元性。保持堤垸内河道的自然走向，不宜过度截弯取直
活化利用	利用堤垸景观资源，拓展教育、观光等产业	鼓励大通湖垸、沅澧垸、湘滨南湖垸合理建设栈道、骑行道、观鸟平台等基础设施，组织垸堤骑行线路

演进类文化景观资源、关联性文化景观资源，以及遗产廊道资源的挖掘识别。2）通过地域特色分区和重点单元 2 个尺度识别保护空间，基于关联性对原来碎片化的资源进行整合，地域特色分区延续地方空间特色，重点单元完整体现文化和自然整体价值。3）提出保护管控措施和利用引导建议，全面指导景观风貌的整体延续和重点保护，以塑造富有地方特色、独具魅力的国土空间。4）建立从省级规划到市县级规划、再到详细规划的传导机制，将整体保护的规划要求落地。

制定整体保护规划，有利于打破各类遗产各自为政的管理现状，加强遗产认知，将目前有价值的资源纳入保护与管控空间，并通过用途管制、规划许可、规划要求传导等规划管理工具加强规划意图的落实。

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尚缺少具体实践反馈，因而需要加强试点和进一步研究。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各地自然和文化环境具有较大差异，有必要在湖南探索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地域的研究来完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重点单元是整体保护的关键空间，省级层面的研究未必能完全掌握全省各类情况差异，有待在市县级层面的研究中细化思考，并通过试点实施的反馈对整体保护方法进行改进。

声明 (Statement)：

本研究对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整体保护的探讨，仅代表作者学术观点，并非实际规划内容。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UNESCO. 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at National Level,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R/OL]. (1972-11-23)[2025-10-08]. https://www.unesco.org/en/legal-affairs/recommendation-concerning-protection-national-level-cultural-and-natural-heritage.

[2]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 与 IUCN 关于“自然-文化之旅”行动的两份文件[EB/OL].（2018-01-03）[2025-10-08]. http://www.icomoschina.org.cn/content/details94_2648.html.

ICOMOS China. Two Documents Regarding the “Nature-Culture Journey” Initiative by ICOMOS and IUCN[EB/OL]. (2018-01-03)[2025-10-08]. http://www.icomoschina.org.cn/content/details94_2648.html.

[3]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联合实践：关于“自然-文化”关键词的阐释性文件（中文版）[EB/OL].（2023-07-18）[2026-03-20]. http://www.icomoschina.org.cn/content/details51_17436.html.

ICOMOS CHINA. Connecting Practice: A Commentary on Nature-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Version)[EB/OL]. (2018-01-03)[2026-03-20]. http://www.icomoschina.org.cn/content/details94_2648.html.

[4] 福州宣言[N].福州日报，2021-08-01（004）.

Fuzhou Declaration[N]. Fuzhou Daily, 2021-08-01(004).
[5] 张兵，罗彦，白杨.整体创造更具自然与文化价值的国土空间[J].中国园林，2023，39（8）：6-14.
ZHANG B, LUO Y, BAI Y. Creating Territorial Space with more Natural and Cultural Values: A Holistic Approach[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3, 39 (8): 6-14.
[6]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T 50357—2005[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Code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for Historic Cities: GB/T 50357–2005[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5.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ndard of Conservation Planning for Historic City: GB/T 50357–2018[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8.
[8] 张春龙，陆益平.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交出“十四五”生态守护圆满答卷[N].湖南日报，2025-11-25（09）.
ZHANG C L, LU Y P. Nanshan National Park Candidate Area Writes a Story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Submitting a Satisfactory Answer Sheet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N]. Hunan Daily, 2025-11-25(09).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指南：TD/T 1090—2023[S].[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2023.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National Land Spac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lans: TD/T 1090–2023[S]. [S.l.: s.n.], 2023.
[10] 赵露.我们不愿成为下一个潦洲岛[N].株洲晚报，2017-09-07（A12-13）.
ZHAO L. We Don't Want to Become the Next Liaozhou Island[N]. Zhuzhou Evening News, 2017-09-07(A12-13).
[11] 邵甬，关星.再探区域性历史文化空间价值特征：以丹沁古灌区为例[J].城市规划，2023，47（10）：30-42.
SHAO Y, GUAN X. Re-exploration of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ce: The Case of Ancient Irrigation Area of Danhe and Qinhe River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3, 47 (10): 30-42.
[12] 张广汉，鞠德东，汤芳菲，等.名城保护理念与方法的演进和展望：从历史文化名城到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J].城市规划，2024，48（S1）：94-100.
ZHANG G H, JU D D, TANG F F, et al. Evolution and Prospect for the Protection System of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From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of Urban-Rural History and Cultur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4, 48 (S1): 94-100.
[13] 陈同滨，王琳峰.传承历史文脉讲述中国故事：“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古代部分）”构建回顾[J].中国勘察设计，2021（11）：28-33.
CHEN T B, WANG L F. Inheriting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elling Chinese Stories: A Review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Rural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 Cultural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ystem (Ancient Part)[J]. China Exploration & Design, 2021 (11): 28-33.
[14] 李小龙，刘丫丫，王树声，等.省级城乡历史文化价值体系规划框架与建构方法[J].规划师，2024，40（4）：16-23.
LI X L, LIU Y Y, WANG S S, et al. Planning Framework and Construction Method of Provincial Urban-Rur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System[J]. Planners, 2024, 40 (4): 16-23.
[15] 白晶，许闻博，孙昊，等.国土空间规划中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探索[J].城市规划学刊，2022（S1）：219-224.
BAI J, XU W B, SUN H, et al.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Planning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2 (S1): 219-224.
[16]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修订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
ZHANG W R.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of Hunan[M]. Revised ed.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21.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 1、2 由作者拍摄；图 3~5、9 由作者绘制；图 6~8 由作者基于湖南省地图改绘，地图审图号湘 S(2023)109 号；表格均由作者绘制。

（编辑 / 王一兰）

作者简介：
胡力骏 / 男 / 硕士 /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遗产院总工程师 / 研究方向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

邵甬 / 女 / 博士 /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分中心主任 /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遗产院院长 / 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历史、遗产保护、城市更新
通信作者邮箱：nyshao163@163.com

陈欢 / 女 /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遗产院一所所长 / 研究方向为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

HU L J, SHAO Y, CHEN H. Exploration of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6, 33(4): 29-38. DOI: 10.3724/j.fjyl.LA20260027.

Exploration of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

HU Lijun, SHAO Yong*, CHEN Huan

Abstract:
[Objectiv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ystematically strengthened its top-level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oth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In the domain of cultural heritage, a comprehensive preservation framework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safeguar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ssets across urban and rural contexts, while actively identifying and documenting emerging heritage categories—including modern heritage and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parallel, China has instituted a national park–centered protected areas system to enhance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natural heritag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institutional strengthening for both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holistic protection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has attracted growing attention. However, three interrelated challenges currently impede it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across China: first, limited recognition of the holistic value and intrinsic significance of heritage assets; second, imprecise delineation of spatial conservation boundaries; and third, fragmented regulatory mechanisms that hinder coordinated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ddress these gaps, this study draws on planning practice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from Hunan Province to propose a

provincial-level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ning. The framework aims to advance methodological rigor in regional-scale spatial governance,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al linkage between planning formulation and on-the-ground implementation, and support the practical realization of holistic protection objectives.

[Methods]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ning for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constitutes a specialized sectoral plan of the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designed specifically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s arising from fragmented, sector-specific protection approach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such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ning is grounded in two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heritage resources—regional and interdependence features. It advances a coherent technical pathway comprising four sequential yet iterative phases: 1) overall value recognition, 2) spatial recognition of conservation areas, 3) tiered spatial regulatory guidance, and 4) implementation-oriented planning transmission. First, it is essential to advance the overall value recognition of heritage. This requires a syste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resources that embody landscape evolution,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 interconnections—while also demonstrating distinctive regional and landscape significance.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to four resource categories: natural landscapes, evolutionary cultural landscapes, associativ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heritage corridors. These categories are intended to address critical gaps in the current heritage protection framework. Second, protection spaces must be delineated through a relational, integrative approach—structured across two complementary tiers: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zones and key units.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zones should be defined holistically, integrating natural geography, built environment attributes (e.g., architectural typologies and material traditions), and socio-cultural continuities. The objective is to safeguard and reinforce local spatial identity over time. Subsequently, key units are to be identified based on heritage value significance, spatial connectivity, and resource concentration—explicitly transcending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Such units must constitute coherent landscape entities with functional and perceptual integrity, and simultaneously serve as operational management units for implementing targeted conservation controls. Third, spatial governance and guidance must be calibrated to the functional logic of characteristic zoning. Withi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zones,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are primarily strategic and facilitative—designed to preserv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amplify regional distinctiveness. Control measures for key units are articulated across two complementary dimensions: 1)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of protection—ensuring the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heritage resources through baseline restrictions on land use, development intensity, and visual intrusion in sensitive areas; 2) landscape enhancement—establishing principled guidelines for compatible land use, spatial transitions, and contextual integration of heritage assets with thei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s. Furthermore, a major project risk assessment mechanism is instituted to support preliminary review of proposed developments with potential heritage impacts. Fourth, planning transmission and implementation must be effective to support characteristic enhancement. A hierarchical implementation framework is to be established—linking provincial-level sectoral plans with municipal/county-level sectoral plans through clearly defined technical alignment. Transmission encompasses three dimensions: 1) heritage resource elements, 2) designated protection spaces, and 3) project-related risk considerations, involving spatial positioning, boundary delineation, refinement of control criteria, inter-municip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integration of major project risk assessments into early-stage planning review processes.

[Results] Drawing on experience from Hunan Province, this study validates the operational feasibility of a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provincial-level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ning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Through systematic analysis of natural geography, built-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o-cultural continuities, the research identified heritage resources aligned with a holistic protection rationale. This enabled the delineation of Hunan Province into six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zones and the subsequent identification of seven categories of key units. Using the Dongting Lake polder embankment unit as a representative case, the paper articulates a four-pillar control strategy—comprising baseline safeguards, construction regulation, landscape design guidanc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within provincial sectoral planning. Moreover, it demonstrates how provincial-level planning mandates are operationally refined and implemented at the municipal/county levels, thereby confirming the functional efficacy and institutional enforceability of the planning transmission mechanism.

[Conclusion] The essence of holistic protection for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lies in safeguarding the dynamic,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societies and natural systems. A holistic protection plan serves as an integrative governance instrument that addresses the fragmentation inherent in current sectoral management regimes. Specifically, it advances a unified 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significance, enables the strategic integration of high-value resources into designated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spaces, and strengthe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objectives through regulatory tools, including land-use controls, planning conditions, permitting procedures, and vertically coordinated transmission of planning mandates. Currently, holistic protection remains in an experimental phase; its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require further refinement through cross-reg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while its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frameworks must be iteratively enhanced through evidence-based learning from pilot implementations.

Keywords: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t provincial level; sectoral planning;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 holistic protection; regional

Authors:

HU Lijun, Master, is chief engineer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SHAO Yong, Ph.D.,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Tongji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World Heritage Institute of Training and Research for the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Shanghai), and dean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rban regeneration.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nyshao163@163.com

CHEN Huan is director of the First Divis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stitute, Shanghai Tongj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